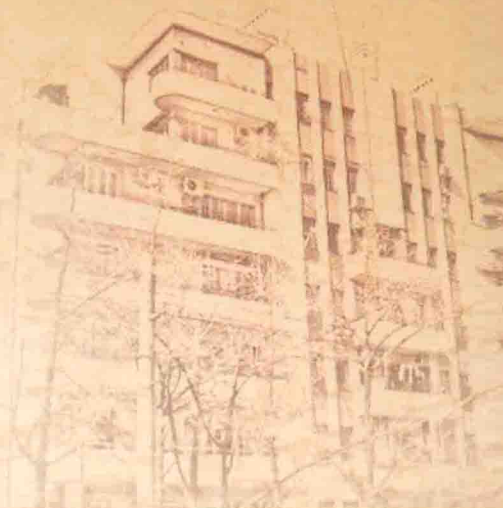




融通中西 · 翻译研究论丛



译者的介入—— 张爱玲文学翻译研究

Translator's Interference:
A Study of Eileen Chang's Literary Translation



■ 王璟 著 By Wang Jing

Eileen Chang is acknowledg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prestigious wri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n important translator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present study brings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into the analysis and thereby provides insight into Eileen Chang's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 cultural identity as writer, female and diaspora.

譯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融通中西 · 翻译研究论丛

译者的介入—— 张爱玲文学翻译研究

Translator's Interference:
A Study of Eileen Chang's Literary Translation



■ 王璟 著 By Wang Jing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者的介入：张爱玲文学翻译研究 / 王璟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308-13159-9

I. ①译… II. ①王…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
—文学翻译—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7647 号

译者的介入——张爱玲文学翻译研究

王璟 著

责任编辑	包灵灵
封面设计	墨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9.75
字数	180 千
版印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13159-9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绪 论	1
1.1 选题背景	1
1.2 选题意义	3
1.3 研究方法	8
1.3.1 文本分析	8
1.3.2 对比分析	8
1.4 研究范围	8
1.5 文献综述	9
1.5.1 张爱玲翻译活动概述	9
1.5.2 国内外张爱玲翻译研究综述	12
第2章 翻译与创作——作家张爱玲与其翻译	15
2.1 张爱玲的创作对其翻译的影响	15
2.1.1 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对其翻译的影响	15
2.1.2 张爱玲的文学修养对其翻译的影响	36
2.2 张爱玲的翻译对其创作的促进	44
2.2.1 张爱玲的翻译对其创作实践的促进	45
2.2.2 张爱玲的翻译对其创作思想的拓展	57
2.3 本章小结	61



第3章 自觉的女性意识——女性张爱玲与其翻译	63
3.1 张爱玲的性别意识	64
3.1.1 张爱玲对女性的认识	64
3.1.2 张爱玲对男性的认识	66
3.1.3 张爱玲的性别意识	69
3.2 在翻译中消解男性中心主义	71
3.2.1 原作中的男权思想	71
3.2.2 具体翻译策略	72
3.3 在翻译中体现女性意识	77
3.4 张爱玲的翻译实践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比较	83
3.4.1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	83
3.4.2 张爱玲的翻译实践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融合与分离	87
3.5 本章小结	96
第4章 文化与翻译——流散者张爱玲与其翻译	98
4.1 流散译者张爱玲	99
4.1.1 张爱玲的生存境遇	99
4.1.2 张爱玲的流散者特征	102
4.2 文化翻译	104
4.2.1 改写情节	107
4.2.2 省略人名	108
4.2.3 增加东方情调的描写	110
4.3 翻译与记忆	114
4.3.1 译本的选择	114
4.3.2 翻译策略	119
4.4 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改写	120
4.5 本章小结	126
第5章 结论	127
5.1 译者的介入——张爱玲文学翻译的特征	127

5.2 本书的研究价值及局限	135
参考文献	138
索 引	147

第1章

绪论

作为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媒介，语言与人类的生活如影随形。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语言，演讲、谈话、写作、思考，等等，都必须以语言为支撑。远古时代的先民视语言为神灵造世的工具。埃及神话中说，人类及世间万物都是神借助语言呼唤出来的。神呼唤“苏彼”和“泰弗纳”，就出现风和雨；当他呼唤出“男人和女人”时，人类就遍布埃及的土地。《旧约·创世记》说上帝在一片混沌苍茫中造出天地万象，并分别命名为昼、夜、天、光、水等，最后还为所造的人命名。在印度的《百道梵书》中，语言是“生主的自体”，是万物及诸神的化生之源。玛雅基切人的圣书《波波尔·乌》中说，人类是造物主创造的唯一能使用语言膜拜神灵的物种。中国的汉族神话中似乎没有语言起源的材料，但各少数民族都有这方面的传说，比如彝族史诗《阿细的先基》说：“男神阿热、女神阿咪用泥土造人，吹上一口气，人就活了，然后，天上刮起大风，风吹进泥人的嘴，肚子里呱呱地响，泥人就会说话了。”总之，古今中外的神话和传说都佐证了语言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

1.1 选题背景

张爱玲(1920—199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①，也是中国 20 世纪文学史上少有的能纯熟地运用双语进行创作和翻译的作家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54 页。

之一。自从张爱玲发表作品以来,跟随着她的创作的批评和研究始终不断,在她去世后引起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从1944年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①发表开始,从批评界到学院内,从境外到境内,有关她的作品研究历史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张爱玲学逐渐成为显学。近年来,随着陈子善不断挖掘张爱玲的少作和佚作,张爱玲的自传性小说《小团圆》、《易经》、《雷峰塔》相继或即将出版,张爱玲的研究再度为人们所重视。

对于张爱玲的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几个主要方向:着重文学技巧的探讨;从社会意识批评其作品思想内涵;从女性本位的立场来评论其小说的价值;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张爱玲;《〈红楼梦〉魔》与《海上花列传》译注的研究^②;电影剧本研究;翻译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对张爱玲的创作部分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后三者的研究已经展开,但是数量不多,深度不够^③,尤以翻译研究为甚。研究张爱玲的翻译方面的文章,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从1979年至2010年之间的仅有十余篇。中国境内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五本,博士学位论文一本,另有四本专著中某个章节的零星介绍^④。

张爱玲的译者生涯自1941年摘译哈而赛(Margaret Harlsey)的《谑而虐》(*With Malice Toward Some*)开始,至1983年《海上花列传》普通话译本发表结束,可以说,翻译活动贯穿了其整个文学生涯。张爱玲的翻译作品包括:《谑而虐》等散文、影评9篇,其中有8篇是自译作品,《老人与海》(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等英汉互译小说6本,《怨女》(*The Rouge of the North*)等自译小说6本^⑤,文学评论5篇^⑥,《爱默森选集》及《美国诗选》中部分诗作,一本剧作《琉璃集》(*The Glass Menagerie*),普通话译注《海上花列传》,此外还有剧本的改编^⑦。从以上简短概述可以看出,张爱玲翻译文学的数量众多、种类复杂,既翻译其本

①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② 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7—17页。

③ 有学者指出,对于张氏所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翻译工作方面的研究缺乏观照,一方面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传奇》中每篇小说之汗牛充栋的长篇论文连篇累牍,一方面却是对这位大家其他卓越成就的漠然无视。参见刘维荣:《海外张爱玲研究述评》,《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73—76页。

④ 见本章第5节文献综述。

⑤ 张爱玲将《金锁记》译成 *The Golden Cangue*, 又将《金锁记》译写成 *The Rouge of the North*, 再将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翻译成《怨女》。此处将《金锁记》的译本按三本计算。

⑥ 包括《海明威论》以及《美国七大小说家》中的三篇及其中的序。

⑦ 根据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的定义,剧本等的改编属于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人作品也翻译他人作品,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既有语际翻译也有语内翻译,涵盖小说、诗歌、散文各体裁,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对张爱玲的翻译研究与对其创作研究以及其翻译成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1.2 选题意义

如前所述,张爱玲的翻译活动贯穿了她整个文学生涯,尤其在离开上海孤岛后,翻译不仅成为张爱玲谋生的手段,更寄托了她进入英美文学界的殷切希望。张爱玲的后半生除了少量的散文创作、零星几部小说作品以及《红楼梦》考证外^①,她的文学产品皆为翻译作品,数量众多、种类复杂。对于完整的张爱玲研究,她的文学作品翻译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研究将翻译家张爱玲作为研究对象,将这位主要享誉于创作的翻译家的一面客观地展示给世人,希望从该侧面对张氏其人进行更为详细的剖析,为有关张爱玲的整体性探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从而使张爱玲研究更加系统化、完整化。

王佐良曾经呼吁译界对重要译者进行集中研究。^②本书认为,王佐良先生所谓的“重要”译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译者的译著数量是足够的,质量是上乘的;二是译者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张爱玲译著无疑数量众多,译艺精湛,这从后文分析即可得知。但是张爱玲作为译者的影响力还谈不上深远。造成张爱玲在中国译坛默默无闻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张爱玲的文名太盛,光芒完全掩盖了她的翻译贡献;二是张爱玲的翻译活动因为得到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的赞助,涉及了中美意识形态之争。而且,张爱玲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翻译实践所体现的诗学观都与主流诗学不一致,造成她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属于低等文学。^③但是,随着张爱玲翻译作品在中国境内出版越来越多,对她的翻译文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张爱玲在中国翻译界的地位将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因此,本书认为,张爱玲应该属于王佐良先生所谓的“重要译者”的范围。

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指出:“译者的地位和角色主要就是跨越文化之间的边界,并带来互动,从而获得一种知识的形式,而这是许多停

① 散文如《谈看书》、《忆胡适之》等,小说如《色·戒》、《小团圆》等。

② 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6页。

③ 详细分析参见王晓莺:《多元视界下的张爱玲的翻译》,《中国翻译》2008年第5期,第25—29页。



留在文化边界内的人所无法获得的。”^①正是因为译者，才促进了两种文化进行交流。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斯塔尔夫人在论翻译的精神时说：“人所能为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②译者对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更是功德无量。然而，在传统翻译观念中，译者始终处于很低的位置。因为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研究就是探讨怎样译、怎样译得好。^③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译者就只能被认为是语际转换的工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阐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等理论兴起，西方翻译研究放开了视野，出现了“文化转向”，形成了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这其中包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Zohar)、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多元系统论及描述翻译学理论，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及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操纵学派”理论。研究者意识到，翻译研究离不开对众多文化因素的考察。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④，与创作文学是并存系统(co-systems)关系，要纳入译入语文化语境考察。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主张研究目的语的文化、政治背景与翻译的互动作用。^⑤当翻译研究视角从文本转向社会文化因素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的主体性问题，因为“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⑥。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对翻译活动中权力政治关系的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性别身份的强调等，也都彰显了译者的主体作用。至此，译者主体的问题才被人们认识。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要正视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杨武能提出，“在这整个的创造性的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

① Anthony Pym,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in Translation and Its Teaching*.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3, p. 150.

② 雪莉·西蒙：《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文化掇客》，陈永国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6页。

③ 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第2—5页。

④ 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陈德鸿、张南峰编：《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⑤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0.

⑥ 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1期，第12—18页。

挥着最积极的作用”^①。许钧则批评道：“长期以来，翻译研究几乎把重点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探讨，而忽视了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活动因素，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②

即便如此，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还是没有被纳入翻译研究的主体部分。“译者和译者个性特征问题在翻译理论中很少受到关注，只是在近年来的一些著作中才见到相关的评论……但迄今仍有一些理论著作中对译者问题闭口不谈。”^③

詹姆斯·S. 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其纲领性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给翻译研究勾画了一个宏观框架，描述了翻译研究所涵盖的内容。在这个框架中，霍姆斯将翻译学分为三个分支：描述翻译研究(DTS)、翻译理论(TTH)、应用翻译研究(ATS)。描述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同属于纯研究性质。其中，描述翻译研究包括三种研究：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过程导向研究(process-oriented)、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产品导向研究是对翻译成品进行研究，包括给个别译本进行描述和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用以探讨某一特定时期、某种语言或是某种文本类型的翻译。功能导向的研究探讨原文如何被翻译，产生了何种影响。过程导向研究致力于描述译者复杂的思维过程。翻译理论主要是利用描写翻译研究的成果，加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原则理论及模式。应用翻译研究则包括翻译教学、翻译辅助手段、翻译政策和翻译批评四个部分。^④我们可以看到，霍姆斯的译学架构包括翻译过程、翻译作品及其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等方面，但是却缺少了对译者的研究，霍姆斯的过程导向研究涉及了译者，但是他偏重的是译者的心理和思维过程，主张对译者大脑中“小小的黑匣子”里面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而译者的个人风格、经历、精神气质等因素则没有纳入他的框架范围。通过译者的翻译，或者说通过译者的个人干预，译本才得以产生，才能谈到翻译过程、翻译成品的作用等一系列研究。换言之，译者的研究，包括译者的风格、决策过程等研究是翻译学中的其他研究绕不开的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

① 杨武能：《翻译、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许钧编：《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②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9页。

③ Irma Sorvali,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 New Perspective*,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6, p. 79.

④ Jame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Holmes, ed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1988, pp. 67-80.



霍姆斯的译学宏图有待完善。

勒菲弗尔提出影响翻译的三要素：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勒菲弗尔认为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包括译者的和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而诗学指的则是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他认为这一切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①勒菲弗尔的论述强调的是外部因素对译者的影响，而忽略了译者的内部因素。本书认为，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种种制约因素都聚集到译者的身上，由译者做出文化判断和抉择，因此译者的内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说译者的因素是影响翻译主体的最主要因素。即便是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意识形态，也必须通过译者来实现。因此，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说只是强调了外部因素，而忽略了译者内部因素对译者的影响。

解构主义翻译观对译者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重视。这类理论消解了原文作者和文本的中心地位，突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诠释和决策作用，译者得以“显形”。但是这类译论的出发点并不是译者，主题思想并没有落在译者的行为方面，更没有将译者的作用和地位进行理论的、系统的论述，译者的功能问题只是作为一种附带产品，而不是其理论的主旨和核心内容。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著作《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的落脚点仍然不是译者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而是“异化”和“归化”或“流畅”和“抵抗”的翻译策略问题。韦努蒂认为，流畅的翻译掩盖了译者的主观阐释，译者的劳动被作者的权威所掩盖，文化与语言差异也随之被遮蔽。因此，韦努蒂提出了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其翻译的诗学目的是要“译出原文利用一词多义、新词、残断句式、异质话语等方式将能指游戏加以前景化”^②的表达方式，“保留外语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生成陌生的和陌生化的译本，从而标示出目标语言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极限，并阻止这些价值观对文化他者实施帝国主义的归化”^③。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是为了抵抗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特征，而归化、异化或流畅、抵抗只是为了达到这一诗学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其理论的重点并不是在执行这些翻译策略的译者身上。

在众多译论中，只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译者地位特别关注，

①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39.

② Lawrence Venuti,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2.

③ Lawrence Venuti,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p. 13.

迎合了翻译研究对译者主体的认识。

女性主义译论强调意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批判传统的原文作者和译文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主张原文与译文的共生关系。该理论将被忽视的译者性别因素列入研究范围,对之进行阐发,揭示性别在翻译中的作用和影响,而且还公开宣布利用译者主体性的性别因素,将翻译视作“重写”,以此反抗原文的男性中心主义和对女性的歧视,彰显了女性/译者的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仅从理论上不遗余力地彰显女性/译者的地位,而且还积极通过翻译实践,利用增补、加些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等方式使女性/译者的声音在译文中显现。

虽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其政治目的,该理论积极彰显译者的地位是为消除性别歧视,但还是在客观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性别视角,极大程度地弘扬了译者的主体性。

“性别”只是研究译者的视角之一。影响译者介入翻译活动的因素还有很多。郑海凌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艺术创造的主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译者系统包括译者本人的生活经验、文化构成、思维能力、外语修养、汉语修养、审美能力、艺术表现力等方面。^①因此,对译者的研究应该着眼于译者这个完整的系统。查明建将“译者主体性”的特征归纳为,“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②。根据查明建的厘定,对译者的研究还应该考察译者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在翻译活动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才能完全揭示“译者背后的总的原因”。^③

在张爱玲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相当程度地介入了翻译活动,译者本人的内部因素,包括她的创作理念、写作素养、性别意识以及她放逐海外的流散经历无不对她的翻译活动起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译者的主体性在张爱玲的翻译实践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本书就是希望通过对张爱玲翻译活动的细致、系统研究,考察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程度、体现在何处、如何体现以及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因素。

这是本书的另一研究意义。

① 郑海凌:《文学翻译学》,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②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的文化地位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22页。

③ 柯飞:《译史研究,以人为本》,《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第31页。



1.3 研究方法

1.3.1 文本分析

这里的文本主要是指张爱玲的创作作品、文论以及翻译作品。本书将对张爱玲的翻译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研究她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特色,并根据需要对张爱玲的创作作品和文论进行梳理,分析张爱玲的诗学观和性别观等,以便考察这些观点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

1.3.2 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包括对比原作与译作、对比张爱玲的译作与其他译者的译本。文本对比分析时主要侧重译者的用词倾向、句法结构、文体适应等方面,以便清晰、准确、客观地找寻张爱玲的翻译策略以及其他译者的不同之处,探究造成差异与不同的原因,将译作的产生与翻译家个人特征联系起来,描述其生成的多项因素。

根据以上研究方法,本书将做以下工作:

1) 搜集张爱玲的所有创作作品、书信进行细读;搜集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文章、传记以及他人有关张爱玲的书信、日记,有选择地进行阅读,以便熟悉并把握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和写作背景,全面了解翻译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环境以及翻译家个人的状态。

2) 汇总张爱玲的译作,对译作进行文本对比分析,研究张爱玲的个人诗学观、意识形态、性别观等因素与其翻译之间的联系。

3) 全面搜集相关材料,回顾、审视并展望张爱玲翻译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为张爱玲翻译现象以及有关该现象的研究进行评价与定位。

1.4 研究范围

如上所述,张爱玲的翻译作品种类繁多,本研究从翻译本体研究出发,剧本的改编将不列入研究范围。张爱玲一生几乎没有创作过诗歌^①,无从分析她的诗歌创作特色,而张爱玲的个人特征集中体现在其小说与散文的

^① 其中的例外是张爱玲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配有两首诗。

创作中。因此,本研究拟将研究范围限制在其小说与散文的翻译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描述张爱玲的翻译特征。

1.5 文献综述

1.5.1 张爱玲翻译活动概述

目前已知张爱玲最早的译作为1941年6月发表于《西风精华》第6期上的《谑而虐》,此译为摘译,选自1938年美国畅销书 *With Malice Toward Some*。《西风精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西风月刊社系列刊物中最晚出的一种。第一种为著名的《西风》,1936年9月创刊,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办刊宗旨,主要撰稿人包括林语堂、老舍等名家。创刊于1940年的季刊《西风精华》旨在“译述西风精华、介绍欧美读物,对西洋文化作进一步之介绍”。其撰稿人也是名家众多,以张爱玲发表《谑而虐》的第6期为例,就有《西风》创办者黄嘉德、夏济安和乔志高等。^①张爱玲的译作能在这本杂志上公开发表,也证明了张爱玲的翻译实力。1943及1944年张爱玲将其四篇英文散文“Still Alive”, “Chinese Life and Fashion”, “Demons and Fairies”,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分别译写^②成《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中国人的宗教》以及《私语》发表于上海《古今》、《天地》两本杂志上^③。期间,张爱玲将其影评“On the Screen-Wife, Vamp, Child”以及“On the Screen-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译写成《借银灯》以及《银宫就学记》发表于《太平》以及《太平洋周报》杂志^④。

1952年夏,张爱玲由沪到港,逗留至1955年秋。当时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为了执行美国政府全球战略布局下的外交与文化政策,以达到

① 陈子善:《翻译英文作品的最初尝试——新发现的张爱玲译作〈谑而虐〉浅说》,《说不尽的张爱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87页。

②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将自己的翻译称为“译写”,本书中“译写”的提法受到他的启示。

③ “Still Alive”, “Chinese Life and Fashion”, “Demons and Fairies”分别于1943年1月、6月、12月发表于 *The Twentieth Century* (《二十世纪》杂志), “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1938年发表于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大美晚报》)。

④ “On the Screen-Wife, Vamp, Child”以及“On the Screen-China: Educating the Family”分别于1943年5月与11月发表于 *The Twentieth Century*。

其政治目的^①，设立了今日世界出版社，以中文发行刊物和书籍，宣扬美国的价值系统。他们除了译介宣扬美国所代表的民主、自由、法治、科学的价值系统的美国文学之外，还组织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尤其要求翻译和介绍具有特定政治倾向的现代文学作品”^②。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寻找的译者都是著名作家和学者，如余光中、叶维廉、金圣华等^③，一为保证译文质量，二是借这些作家的名声壮大译作声势，达到翻译目的。张爱玲就在译者之列。

张爱玲初来香港，为了维持生计接受了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的翻译任务，翻译了一些美国文学名家名作。先后译有《老人与海》(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鹿苑长春》(Marjorie Kian Rawlings, *The Yearling*)^④、《爱默森文选》(Ralph Waldo Emerson, *The Portable Emerson*)^⑤、《美国诗选》中部分诗作以及编者言、《欧文小说选》之《睡谷故事》(Washington Irving,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⑥、《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s*)之序言以及其中三篇^⑦，《海明威论》(Robert Pen Warren, *Hemingway*)、*Fool in the Reeds*(陈纪滢，《荻村传》)。除此之外，张爱玲还接受了美国新闻处驻香港办事处的写作任务，创作了 *The Rice-Sprout Song: A Novel of Modern China* 与《赤地之恋》，张爱玲后将这两部作品翻译成《秧歌》与 *The Naked Earth*^⑧。在所翻译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张爱玲最喜欢的是《老人与海》。她在1954年11月为第三版的中译本作了一篇称得上饱含深情的序言，表达了对该作品的欣赏和喜爱以及对海明威的敬意。她极少给这一时期的其他译作写序，除了《爱默森文选》是应编辑要求，介绍爱默森生平创作和主要思想。这足以见得她对《老人与海》的喜爱。张爱玲不仅是一个认真写作的作家，同样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译者，她利用自身的语言天赋，为我们奉上了这些美国名著

① 参见单德兴：《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和文化政治》，《翻译与脉络》，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130页。

② 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③ 单德兴：《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中译——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学翻译和文化政治》，《翻译与脉络》，第122—123页。

④ 原名为《小鹿》，1953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再版时更改为《鹿苑长春》。

⑤ 最初版为1953年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的《爱默森选集》，后重版时，不同的出版社冠以不同的名称，或《爱默森选集》或《爱默森文选》。

⑥ 《无头骑士》为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54年初版时所用名称，1967年再版时改为《睡谷故事》。

⑦ 这三篇分别为《辛克莱·路易斯》、《欧涅斯·海明威》、《汤麦斯·吴尔甫》。

⑧ 《秧歌》1954年由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The Naked Earth* 1954年由Union Press出版。

的初译本，其中绝大部分到今天仍称得上是原著最好的译本之一。

1955年，张爱玲赴美定居。次年，她开始翻译成名作《金锁记》，将其翻译成为 *Pink Tears*，出版遭拒，遂将其改译成 *The Rouge of the North*，之后又将 *The Rouge of the North* 翻译成《怨女》，1966年由香港《星岛日报》出版，历时十年。最后又应夏志清之邀将《金锁记》直译成 *The Golden Cangue*，1967年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所出的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 中。1957年张爱玲将其英文作品 *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 翻译成《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刊登于台北的《文学杂志》上。1961年，她把《桂花蒸 阿小悲秋》节译成英文，收进聂华苓编译的《中国女作家的八部短篇小说》。此外，她还改编或节译过《魂归离恨天》、《一曲难忘》、《伊凡生命中的一天》、《玛曲昂娜的家》等。其中前两部是为香港电懋公司改编的剧本，后两部是为美国之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

1961年秋，张爱玲造访台湾，这是她有生之年唯一一次造访台湾。1963年3月，张爱玲将此行的见闻写成一篇英文游记 *A Return to the Frontier* 发表于美国杂志 *The Reporter* 上。这篇游记在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1980年张爱玲以中文译写这篇游记为《重访边城》。2007年张爱玲的版权继承人宋以朗整理发现了这篇当时未发表的译写本，并于2008年由皇冠文化有限公司出版^①。

1967年张爱玲获得马萨诸塞州剑桥瑞克利夫研究院基金资助，得以实现自己的夙愿，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又称《海上花》）。《海上花列传》是韩邦庆于1894年出版的一部长达40多万字的吴方言小说。鲁迅不仅在《中国小说史略》将其列为清“狭邪小说”压卷之作，还称赞它“平淡而近自然”。胡适对这部小说也极为推崇，称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②。张爱玲更是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文学“平淡而近自然”的最高理想。张爱玲花了十余年时间，先后将其译为英语本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和普通话注译本《海上花列传》。英译本只发表了其中的第一、二章^③。20世纪80年代中期，张爱玲寓所遭窃，丢失了英译《海上花列传》定稿。其余各章的手稿经过香港中文大学的孔慧怡博士艰苦的整理润色，2005年由美国

① 见张爱玲：《〈重访边城〉之编辑说明》，台北：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3—5页。

② 胡适：《亚东本〈海上花列传〉序》，《重印亚东本〈海上花列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③ 198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译丛》（*Renditions*）杂志《通俗小说特大号》上发表。